

如何 研究中国

增 | 订 | 本

曹锦清◎著



以中国为中心 | 以中国为方法
以历史的视角理解中国 | 以世界的视野研究中国
新形势·新问题·新探索

如何 研究中国

增 | 订 | 本

曹锦清◎著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何研究中国/曹锦清著.—2 版(增订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7-208-15158-1

I. ①如… II. ①曹… III. ①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4772 号

责任编辑 于力平
封扉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如何研究中国(增订本)

曹锦清 著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31.25
插 页 4
字 数 382,000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158-1/C·564
定 价 88.00 元

增订本代前言

——中华民族与中国版图*

中国到底往哪里去,不仅中国人关注,而且全球人都在关注,因为中国的崛起将会改变中国国内乃至全球的资源分配格局。近十年来,西方人试图凭借西方的概念来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解中国的政治运行,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但是这些研究和解释大体出错。西方人不断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必须抛弃西方的概念才能理解中国,因为它的概念已经丧失解释能力,在被用来理解一个庞大民族的崛起时,已经丧失了它的认知功能。因而,学界提出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意思是把中国的当下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放入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来重新加以审视。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延伸。

拙文主要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到当代的

* 本书此次再版,新增 11 篇文章,删除 2 篇文章,并调整了篇章结构与布局,分为“如何理解传统中国”“如何研究当代中国”“如何研究中国的农村与城市”三个部分,以期突出“如何研究中国”之主旨,彰显曹锦清教授对中国学研究的新贡献!新增的文章有:《增订本代前言——中华民族与中国版图》《从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视角重看中国百年思潮》《当代中国国家战略》《当代中国土地制度:农民工与工业化、城市化》《印度归来话中印比较》《三十年来的农村中国》《保卫我们的土地》《当代中国城市化与社会转型》《代跋一 回归传统:新中国的“更化”》《代跋二 中国的“天命”》《附录 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及其当代挑战》。删除的文章有:《〈黄河边的中国〉前后的故事》《代跋:思想为何放弃职守——知识精英阶层责任缺失的社会历史分析》。——编者注

基本历史脉络是什么,以及中华民族这个大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版图是如何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扩展到长城内外的?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传统上或者说在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人对历史的表述有三种。一种说法是3 000年文明,这是指从周开始,至今3 000余年。另一个说法是4 000年文明史,那是从夏开始。还有一种说法是5 000年文明史,这是按照《史记》的传统。司马迁的《史记》是部通史,从黄帝开始写起,从那时算起,至今是5 000年文明史。

按照西方的标准,一个民族从野蛮状态跨入文明的门槛,有两个重大的标志,第一是城市的出现,第二是文字的出现。按照这两个标准,中国5 000年的历史还在考察之中,因为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保留最早的是在商朝。商朝凡600年,前200年其国都在黄河流域,迁移不定,到了中期迁移到了现在的汤阴,也就是盘庚迁阴,商的第一个国都是在此地被考古发现的。目前正在寻找夏朝的国都,关于夏朝的国都在哪里,史学界有不同的说法,但是都没有确切的依据。考古学家正在寻找中国5 000年前的国都,寻找5 000年的文字,这个任务并未完成。如果从城市和文字这两个标准出发,我们的文明应从商朝开始。

现在我们都讲5 000年文明史,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所以,中华民族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历史特别悠久及它的绵延不绝,它跨越5 000年文明而历久弥新、弥大。这一特征是和其他古文明相比较而存在的。人类文明最早出现在欧亚大陆的北纬23°到30°之间,出现在四大河流域。这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两大文明早在2 000多年前就湮没与断绝了,印度文明有断裂也有延

续,它从最早的婆罗门教到佛教再到现在的印度教,从宗教文化的角度讲,它有它的延续性,但是从政治版图角度看,印度一直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曾经有印度人统计过,印度只统一过一次,也即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这个王朝崩溃以后,印度再也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王朝,以后的王朝都由外来民族建立,最后给印度版图统一外观的是英国。印度作为一个宗教文明绵延了3000多年,但印度的本土文化却被外来的文化消灭了。

再看古希腊和古罗马。古希腊是城邦制国家,每个国家人口不超过10万。几百个城邦争斗不止,内战不息,当它的新帝国兴起的时候,城邦就成为一个过时的政体而在历史上湮没无闻。希腊的文化虽然绵延下来了,但是希腊人从此走向了衰亡。接下来的古罗马在它的强盛期把整个地中海都变成它的内海,但是罗马帝国在公元4—5世纪崩溃以后,再也没有建立起帝国。西方人一直想要恢复古罗马的辉煌,一直到希特勒还想建立第三帝国,但是最终失败了。所以,罗马人从伟大的罗马人变成了可怜的意大利人,并且,意大利人也不完全是罗马人的直系后裔。一个城邦制国家消失了,一个军事殖民帝国消失了,从此不再延续。观察西方文化,谈论2500多年的西方文明,我们不要忘记它的载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一个载体是希腊人,第二个是罗马人,第三个才是日耳曼人。日耳曼人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用1000多年时间消化和吸收希腊与罗马的文字和思想,一直到1500年以后,西方人也就是现在的西欧人才踏上了一条文明创新的历史道路,赶上了大航海时代、商业扩展时代、工业化时代。所以,西方文明的载体是不一样的,而现在的西方文明载体已经越过了大西洋,美国是当前西方文明的核心载体。唯有中华民族历5000年没有断绝,是同一个民族在不断地扩展,不断地绵延。

中华民族的壮大有其历史过程,笔者称之为滚雪球式的融合、壮大。这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通过春秋战国的战争融合，秦汉的统一标志着诸夏国家统一为一个单一的郡县制国家。秦朝由于它的王朝短促而颇受后世儒家的攻击，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评价向来很低。但是，作为中国版图的第一个统一者，他第一次把长城以南、海南岛以北都归入到大秦的版图。汉从秦制，所以，中华民族第一次大的融合是在秦汉之间。在西方对中国入侵以前，也就是西方从冷兵器进入热兵器时代以前，整个欧亚大陆的主要问题是偏南方的农业文明和偏北方的游牧部落之间的关系问题。古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长城为界的农耕民族和游牧部落之间的融合与战争。一直到汉武帝时期，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休养生息，终于建立起巨大的国力。汉朝分前汉和后汉，享国 400 年（后人以汉来指称我们华夏民族，汉的出现标志着华夏民族第一次伟大融合的完成）。当时，在北方，与秦汉相对立的北方游牧部落也第一次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形态，对长城以南的农耕文明的汉民族构成了强大的军事威胁。

（二）第二阶段

东汉以后分裂为三方，曹操统一了北方，但是赤壁之战的失败，导致三足鼎立的局面出现。尔后，在魏国，司马懿集团在曹魏政权势力上升，建立了西晋。西晋经历了短暂的统一，之后进入八王之乱。之后的一二百年内，北方少数民族趁中原战乱大举南下，几乎占据了整个黄河流域，和未向南迁的汉民族在这里发生了冲突也进行了融合。所以，汉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在黄河流域进行了一次混血，最后被汉文明所同化。东晋南迁到现在的南京，当时称作建康，并建立了东晋。并由此建立宋齐梁陈，史称南朝。北朝也经历过北魏、北齐、北周等。这一段时期对于华夏民族而言是一个战争、冲突、流亡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大融合的时期。

生活在那个时期的老百姓是极其痛苦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数百年的痛苦、战乱和流离失所，为佛教进入中国扫清了道路，或者说，中国接受佛教的社会心理因素已经具备了。

从民族融合角度来看，一是北方的游牧部落进入黄河流域，和残存在黄河流域的汉人进行通婚，进行融合。二是黄河流域相当一部分汉族迁移到了南方，这是汉民族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南迁，和长江流域的，包括更南的广东和福建的土著，进行了通婚和融合。当时的土著有各种称呼，统称为北越（这个越和现在广东省简称的那个粤是同音同义不同字）。北方先进的农耕文明和政治管理形式也向南方移动，这样，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再加上珠江流域就形成了一个大唐盛世，中华民族迎来了第二次伟大的融合。

大唐盛世结束得太早，唐朝于公元 618 年建立，755 年发生安史之乱，中央政权衰微，地方势力坐大，史称藩镇割据，对那些不断进入中国的少数民族也无力加以反抗。公元 907 年之后，大唐崩溃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十国这个阶段比较短暂，这一时期又是一个民族融合的高潮，也是汉族继续南下的高潮。

之后，历史进入宋朝时期。宋在经济上比较发达，技术上有所创新，文化上十分辉煌，但是军事上特别羸弱。原因是宋定都开封，北面黄河，无险可据，另外，河西走廊和河套流域被西夏占领，蒙古草原被辽、金占领，这样，一个主要的战略武器也就是马匹特别少，而单靠步兵不足以战胜强大的骑兵。

宋朝羸弱，一直到了蒙古民族在漠北的兴起，也就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崛起于漠北。成吉思汗先向西进行扩张，进入中亚，也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一带，然后，蒙古骑兵加上中亚骑兵（蒙古人联合了色目人，也就是现在回族的祖先。中亚人因为肤色有些白，眼睛有颜色，所以

我们把他们叫做色目人),自西向东,先灭亡了西夏,而后与南宋合作攻辽,再之后,蒙古军队越过长江,攻入四川、云南,最后把南宋消灭,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大元帝国。这个游牧民族建立的强大国家的汉化程度不够,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继承能力较差,也造成统治经验不足,享国不到百年就被朱元璋所灭。但是,大元帝国的建立也为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及版图的进一步扩展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云南正式并入中国的版图,并且从此成为中华民族永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应该说是元朝所开创的。大元的版图,为各民族的融合,包括欧亚大陆的交往、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功不可没。

当然,这一次东西交流,主要是对西方有利。如果没有这次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大概就不会传到西方,而没有中国的四大发明,西方的崛起是不可能的,这不是笔者的判断,而出自西方的伟大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当然,这对中国也有一些好处,比如说,中东的伊斯兰教历也即天文学传到了中国。元朝大科学家郭守敬是回族人,明朝的郑和也是回族人。所以,民族的融合和版图的扩展在汉唐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

(三) 第三阶段

最后是为我们当前 13 亿人的中华民族奠定了政治基础的明清两朝,尤其是清朝。中国自两汉以后,一直以中国人或汉人来指称自己。民族这个概念是从西方输入的,所以,近代以来,如何根据西方概念来进行自我指称就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实,这两句话不是孙中山的原创,而来源于明朝的《讨元檄文》。朱元璋定都南京以后,派徐达率数万大军直捣大都(今北京),出发前让刘基写了《讨元檄文》,檄文里面就有这两句话,所以,朱元璋的起义有民族革命的意思。这两句话被孙中山吸纳了,但是孙中山所说的“鞑虏”指的并不是从

海上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而是指满族贵族。但是,要把满族贵族驱逐出去,赶回老家,老家又在哪里呢?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一部分可以称为满族的老家,辽宁省则一直在大明的有效管制之下。“驱除鞑虏”之后建立的中华民族的版图又应如何划分呢?孙中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这种狭隘的种族革命妨碍了他对未来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版图的考虑,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才想到五族共和,在五族的基础上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中华民族”这个词是梁启超于1905年前后首先提出来的。按照西方的标准,要建立起一个民族国家,或者叫state,或者叫nation,或者叫state-nation,总而言之,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中国主要有五大民族,所以,孙中山再把五大民族包含在一个概念之下,叫中华民族。

解放以后,我们按照四个标准——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进行了民族识别,结果,越识别,民族越多,一直到1979年定下56个民族。近代以来,中国被迫纳入西方的话语体系里面,只能用西方的概念来进行自我表达,这就产生了问题。需要考虑的是,首先,56个民族都很古老,有各自的文化和血脉传统。其次,中华民族还很年轻,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才产生100年多一点,所以,要形成中华民族这个共同的观念,要维持中华民族永不分裂,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二、中国的版图是如何扩展的?

版图、主权、边界等概念都是西方独有的,中国人不具备。State这个概念形成于17世纪初,它主要有这几个要素:明确划分的边界;边界内的人民受一个主权者统治;所有的主权国家平等,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国际法

制约。这些概念,中国自古以来是不具备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西在这个问题上怎么也谈不拢。在西方人看来,他们是来要求通商、贸易,在其他国家的首都设立使馆,互派大使,在欧洲这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惯例,在中国却没有这个观念,中国人没有平等的主权国家的概念。

关于中国人传统的版图概念,我们可以称之为家国天下观。这个国叫中国。中国自秦汉以后就采取郡县制,对郡县以下的农民采取编户齐民的方式。

凡是不能列入郡县制的,中国就采取第二类的治理方式,一般叫做边疆,不叫边界,它包含了广阔的国土,这些国土包括北方的游牧部落。因为游牧部落不采取属地原则,而是属人原则,用清代的语言说就是盟、旗(现在,盟和旗变成一个行政区划概念,在古代则是族群概念,人群概念),凡在土地上流动的都不属于郡县制管理。

一国是要有两制的,南方的丘陵、山区很少有定居的农业,我们称之为游农,也就是流动的农业。在这些地方一般也不设置郡县。所以,古代的边疆概念用清代版图来理解的话,它包括内地中国,指的是长城以南,十八个行省,大体上是明朝的故土。长城以外主要是东三省、内外蒙、新疆、西藏等,属于边疆的概念。在这些地方,清朝是不采用郡县制的,而是用其他的治理方式。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并用西方关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认识自身,而后又形成边界的概念。我们花了60年的时间把22 000公里陆路边界中的20 000公里划定了,只留下了和印度接壤的2 000公里的边界尚待划清。

海疆论更是一个极其现代的概念,古代中国没有这个概念,近代有了,也是按照西方的概念来理解,比如大陆架、中间线、专属经济开发区等。如果按照西方概念来理解的话,我们和周边国家是什么关系?中国

崛起以后,周边国家会产生怎样的反应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大问题。

近代以来,我们按照西方主权国家的边界理论来划定我们的国界,由于我们对这个西方概念理解不清,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和北面俄罗斯的边界,现在也搞不清楚。因为我们原来有一个漫无边际的边疆概念,边疆是国土,边界是一条线。根据《尼布楚条约》来看北方这个边界,我们少了大概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西边也是这样(我们讲新疆的西边),这两块地大概是 147 万平方公里,加上外蒙古,总共 300 多万平方公里国土,所以,大清的版图是 960 万平方公里再加上 300 多万平方公里,由于我们对边疆的概念没有迅速纳入西方的观念体系并按照这个观念和外国人打交道,由于认识上的滞后,从而吃了大亏。

中国版图的扩展是个自然的形成史,不是一个军事殖民的历史。近代崛起的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版图的扩张总是对外军事扩张的结果。和西方相比较,中国是一个强大而和平的国家。关于这一点,西方很多学者都在重新加以研究,他们希望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崛起之后,会不会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中国人宣称和平崛起,但西方人不信。因为西方所有国家的崛起都意味着对外扩张,这是他们共同的历史经验与历史记忆。

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对外战争,在南部、在北部都发生过战争。我们和北方强大的匈奴、突厥进行过殊死搏斗,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但是,可以负责任地讲,其中多是自卫反击战,没有攻城略地的记录。原因非常简单,我们的版图已经足够大,一个中央政权要管理这么辽阔的国土和如此众多的国民,要解决的内部问题已经耗尽了中国政治家的所有精力。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是如此!

我们不要邻国的一寸土地,我们只是守住已有的东西。我们要用 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18 亿亩耕地养活现在的 13 亿人口(未来的人口最高峰可能会有 14.6 亿),为实现这一点,我们主要利用国内的资源。其次是通过和平的贸易,利用海外资源,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来养活、养好 13 亿人口。如何养好 13 亿人口,如何避免由资源匮乏形成的内部冲突,这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

当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有两个市场。原因非常简单,在农耕时代,我们只要有一个国内市场就足够了。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自给自足的民族。葡萄牙、西班牙自 1530 年前后就开始和中国进行贸易,一直持续到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这 300 多年,我们和西方进行的是单边贸易。在 1800 年以前,中国人口占全球 1/3,中国 GDP 占全球的 1/3(所以,所谓中华民族崛起的说法是不对的,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后,维持中华民族的统一,维系中国政治版图的统一,我们有传统的有利因素,同时,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关于传统因素,一般来说,学者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中国的文字。

语言文字的背后是文明。中国文字对中国的大一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的文字从希腊、罗马开始就是拼音文字。拼音的优点在于学习语言相对容易,其次是文字跟着语音走,语言和文字是不脱节的,这是拼音文字的优点。但是,也正是这个优点,给西方造成了一个极大的缺点:政治上的不统一。自 1500 年后,西方各个主权国家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觉醒以后,统一的宗教崩溃了,统一的文字也崩溃了。拉丁语分解成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字,德语产生了,法语产生了,英语产生了,还有其他的各种小语种。所以,拼音文字为欧洲的分裂奠定了文字学基础,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痛定思痛,欧洲才希望重新统一。

欧洲各个民族国家很了不起,他们不打仗,通过谈判而形成一个欧

盟,我们要给予充分重视。但是,由于语言的不统一,欧盟要想成为一个有效运作的机构特别困难。为什么?因为每个民族都采用自己的文字,所有的发言都用本民族的文字,结果,他们的会议成本也高得一塌糊涂。

中国的象形文字系统,在音、形、义当中,形指义,音也指义。这给我们带来的不便之处是,我们的语言和文字可以脱节。所以文言文和日常老百姓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优点则是这个大一统的政治和大一统的文字相结合,凌驾于各种方言之上。所有方言地区的学生,只要读四书五经,只要按官方的发音,在全国范围内就可以交流。因此,是文字维系着各民族的统一,各省份的统一,乃至中国的统一。

序

逝者如斯，忽已临花甲之年。诸生从我历年的讲演、访谈和文章中选出若干汇为一集。出版还是不出版？问题虽没有哈姆雷特的那么严重，但于我却着实犹豫半年有余。这些被我遗忘许久的访谈、讲演稿重新结集出版，有无必要，对读者是否有欠尊重？我不确定。于是诸生邀来出版社的朋友，说此一问题最好交由出版社来判断。

诸生将文集分为三部分：一谈研究方法，二谈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三是理解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经他们这一分类，我也对近几年的思考重心有了新的认识。

远在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针对知识分子集中关注的“应该”，我们转向“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于是强调以实证为方法。后来才发现，“应该”的背后是“普世说”！而“普世说”背后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方法论。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这是没有疑问的。但研究中国问题，不“应该”以“西方为中心”，而“应该”以“中国为中心”。其实，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毛泽东就已经解决了这个近代中国的难题。他说研究中国，要以“中国为中心”（《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 年），并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解决了“古—今”和“中—外”矛盾的长期纠缠。但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学术界，“古—今”和“中—西”却重新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当然，“方法论”背后说到底是个民族自信问题。幸赖改革开放 30 余年经济上所取得的辉煌，才多少医治了我们民族近代百年心理上的卑怯，让我们获得了平视（但愿不要走向“俯视”他人的另一极端）西方的

自信。凭借这份自信,我们或许也将摆脱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怨恨与鄙视,它不该替晚清的腐败、积贫积弱及挨打屈辱承担全部的罪责。事实上,指向民族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步成功,都会给我们民族增添一份自信,而每一份自信都会给我们的悠久历史与文化增添一份自尊,并从中领会对当代的重要启示。所谓文化创新,究其实就是中西两大文化在更高意义上的融合过程。至于“三农”问题,我以为中央 2004 年提出的“两个趋势”及随后提出的“二元结构”的两个论断最为重要。我一直想依此对“三农”问题作一系统的理解,但至今仍未成形,近来有些讲演提纲,亦未收入文集内。

近些年来,我很少发表文章,究其原因,倒不是出于懒惰,相反,每有机会我便要到祖国各地去走走看看。平日处书斋,读书每有会意,也欣然命笔,颇得“五柳先生”之意。之所以少有文章发表,实出于我对“复杂性”怀有日益增强的敬畏之情。所谓“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与信息化”已经将社会生活“世界化”得扑朔迷离。学科日益分化,本以为可以分工协作来“摸象”,然而我们只见学术界概念飞舞,真实的大象竟不知逸向何处丛林。处急剧转型之世,名不指实已到了令一切思者深感无奈与颓衰之境地,禅宗家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实非虚语。中华民族因现代化进程而日获自信,而面对日趋复杂的世界,我却只有迷惑。早年希望“认识中国”的轻狂,到如今只剩下卑谦的无奈。虽时时有人请我写点说点什么,几年也结成此文集,然其间有无摸到“大象”,实不敢妄下断言。

当然,敬畏“复杂性”并非陷入不可知论的充分理由,六根未净的我也未达至高僧“语默”的境界。思想既要执行认识的职能,就须信仰复杂世界的可知性,于是我还得观察,还得思索,还得努力写点什么。此中,唯愿己身“不知老之将至”。

曹锦清

2010 年 3 月 5 日

目 录

增订本代前言——中华民族与中国版图 001

序 013

如何理解传统中国 001

宋以来乡村组织重建——历史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 003

民权与国族——孙中山对东西文化的思考与论述 017

中国的和平传统：一个历史的考察 021

和谐社会：传统思想资源及其当代启示 066

论国学的可能意义 100

儒学复兴之路——梁漱溟论东西文化特质 128

如何研究当代中国 133

论中国研究的方法 135

从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视角重看中国百年思潮 151

当代中国国家战略 176

当代中国土地制度：农民工与工业化、城市化 188

四个历史观与近六十年的历史 202

从“以西方为中心”到“以中国为中心” 208

印度归来话中印比较 212

理解中国——曹锦清教授访谈录 226